

略论约巴战争的起因

赵文亮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2)

摘要: 约巴战争是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多种矛盾长期存在、相互交合的产物,是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冲突问题上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约巴双方关于巴勒斯坦归属及其解决方式的尖锐对立是最基本的原因;巴解游击战略及其在约旦的“国中之国”地位对约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导致双方摩擦和对抗的日益升级;罗杰斯计划将双方推向了摊牌的边缘;阿拉伯国家及美国的怂恿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人阵”劫机事件点燃了导火索,约巴战争最终爆发。

关键词: 约巴冲突;巴解游击战略;罗杰斯计划;“人阵”劫机事件

中图分类号: K3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8)05-0088-04

作者简介: 赵文亮(1964—),河南汝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和犹太人问题研究。

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武装之间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历史上称为“约旦战争”或“约旦内战”。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被打死打伤,并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的死亡,巴解组织遭受重创而被逐出约旦。由于这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巴解组织愤怒地称之为“黑九月”。

约巴战争是阿拉伯人的一场“内战”,是战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插曲。同时,约巴战争也是一场国际冲突,是中东冲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出兵支持巴解组织和约旦,埃及、苏丹等国积极进行斡旋,美国、以色列也程度不同地卷了进去。这场战争对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场兄弟相残的战争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约旦与巴解组织多种矛盾长期存在、相互交合的产物,是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冲突问题上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

一、关于巴勒斯坦归属的尖锐对立

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同为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一直并肩作战,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约旦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约旦和巴解组织一直同床异梦,在巴勒斯坦归属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历史上,约旦和巴勒斯坦统称巴勒斯坦地区。1921年3月,英国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部分:约旦河以东为外约旦,建立外约旦埃米尔国;约旦河以西为巴勒斯坦,由英国直接统治。此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一世先后提出过“大约旦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试图将巴勒斯坦纳入自己的版图^{[1](P2)}。1946年外约旦独立,更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后,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计划。阿卜杜拉坚决反对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积极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并亲自担任阿拉伯联军总司令。虽然阿拉伯国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约旦却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在阿卜杜拉的鼓励和支持下,1949年12月,

3000 名代表在查里科举行大会。大会决议要求约旦和巴勒斯坦在阿卜杜拉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并授予他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力^{[1](P2)}。1950 年 4 月,约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赞成“约旦河两岸完全统一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约旦哈希姆王国,它的首脑是阿卜杜拉·侯赛因国王”^{[2](P19)}。一周后,西岸被正式兼并。此后,约旦政府实行同化和安抚政策,授予 81 万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并任用一大批巴勒斯坦人进入约旦议会和各级机构任职。侯赛因继任国王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努力通过合作和控制将单独的巴勒斯坦实体纳入一个巨大的约旦框架内”^{[3](P5)}。但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后,其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要求将整个巴勒斯坦置于约旦的统治之下,而仅仅要求恢复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管辖权。

阿卜杜拉一世的政策是以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的^[4]。因此,约旦的“大约旦计划”自然遭到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巴勒斯坦人的反对。早在 1948 年 9 月,巴勒斯坦人就在加沙地带建立过一个“全巴勒斯坦政府”以阻止阿卜杜拉兼并巴勒斯坦的企图^[5]。他们指责阿卜杜拉“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1](P13)},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攫取领土的叛逆者”^{[2](P19)}。出于愤怒,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于 1951 年 7 月刺杀了阿卜杜拉。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要实现“大巴勒斯坦计划”,建立一个领土横跨约旦河两岸的大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建立后,其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宣布约旦的所有地方和以色列都是巴勒斯坦的组成部分,应该归还给巴勒斯坦人^{[6](P276)}。阿拉法特任巴解主席后,虽然不赞成“大巴勒斯坦计划”,但他所提出的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仍然是与约旦相矛盾的。双方关于巴勒斯坦归属问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然以战争解决。

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式的悖逆

尽管约旦与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双方的战略目标及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一致的:通过战争打败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为此双方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和相互支持。约旦不仅直接参加了三次中东战争,而且在巴解组织建立后把本国作为其活动的基地,开展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惨败,对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约旦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正视以色列存在这一现

实并试图与之单独媾和的阿拉伯国家。为了取得以色列对约旦兼并西岸的认可,阿卜杜拉在 1948 年战争后不久就通过秘密渠道谋求与以色列谈判。侯赛因执政上台后虽然曾公开反对与以色列之间的任何解决,声称要“完全恢复整个巴勒斯坦”^{[3](P6)},但实际上继承了阿卜杜拉的政策,1963 年起开始与以色列暗中和谈;1967 年战争的再次惨败更坚定了以政治解决达到有限目标的决心。1968—1972 年间,侯赛因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举行了多达 10 到 12 次会晤,仅仅在 1968 年 9 月就分别与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和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会谈过 3 次^{[7](P5)}。1969 年起,约旦积极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倡议下的和平解决方案,并遏制巴解组织游击队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他“反对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毁灭以色列的观点”,“坚信巴勒斯坦人回归故乡的方法是通过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3](P10)}。

约旦的政治解决方针遭到巴解组织的坚决反对。阿卜杜拉的被刺也是激进分子担心他与以色列议和所致。巴解组织建立后很快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64 年,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民族宪章》明确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它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而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阶段。”^{[8](P278)} 1968 年 7 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重申《民族宪章》,特别指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的巴勒斯坦革命来表达他们自己坚强的决心,拒绝一切取代巴勒斯坦全部解放的所有解决办法。”^{[8](P278)} 阿拉法特在 1969 年初成为巴解组织主席后,“拒不接受任何‘政治解决问题’的提议”^{[9](P66)}。

三、巴解游击战略对约旦安全的严重威胁

1968 年起,巴解组织采用游击战略,对以色列发动跨界进攻。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频繁发动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按照以色列人的记录,巴解组织的袭击活动在 1967 年为 97 起,1968 年为 916 起,到 1969 年则为 2432 起^{[9](P79)}。巴解组织的袭击导致以色列巴解组织和约旦的猛烈报复,由此给约旦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财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约旦经济,而且影响了约旦的和平解决政策,并迫使约旦也卷入了与以色列的战争对峙之中。虽然双方多次达成协议,阿拉法特也一再保证与约旦军队合作,但巴解游击队依然我行我素,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不断加剧。巴解组织的行动不仅影响了约旦与以色列政治谈判战略的实施,而且使约旦陷入与其强大的邻

居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險之中。双方的矛盾因此越来越尖锐。

四、“国中之国”地位与约巴摩擦的升级

到上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境内迅速壮大起来,先后控制了包括难民营在内的大片地区,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巴解组织在全国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法塔赫”统治着巴勒斯坦难民营,禁止约旦士兵、警察和官员进入;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随意设置关卡,拦截汽车,检查证件,非法征税;他们调戏妇女,绑架富商,勒索赎金;他们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和侮辱约旦官员和士兵。巴解组织还渗透到约旦军队,秘密发展一些中高级军官;他们还取得了当地伊拉克军队的支持。更有甚者,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还把矛头指向侯赛因国王,称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巴解组织上下普遍认为,抵抗运动应该致力于在约旦夺取政权,叫嚣“一切权力归抵抗运动”“通向特拉维夫的道路经过安曼和贝鲁特”^[10]。逐渐壮大的巴解武装力量对约旦主权构成了挑战,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

游击队的行为是侯赛因国王难以容忍的。早在1968年夏,他就威胁要“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打击游击队^{[9](P70)}。1968年9月,国王的车队遭到游击队袭击,政府军队同游击队在安曼展开激战。1968年秋天之后,“法塔赫”与约旦军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中最严重的是11月初约旦军队与游击队在安曼郊区的两个难民营激战3天之久,造成28名巴勒斯坦人和4名约旦军人被打死。11月6日,双方达成了“七点协议”,规定不准游击队员身穿制服携带武器在城市中行走,不准招募约旦军队的逃兵,并禁止他们从约旦的东岸炮轰以色列的目标^{[9](P70)}。但是游击队经常违背这一协议。1968年中到1969年底之间,双方发生了不下500次暴力冲突。

1970年2月10日,侯赛因国王颁布“十一点政令”,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巴解组织不执行政令,并建立一个阿拉法特领导的联合军事司令部,以抵抗约旦政府。约旦警察与游击队在安曼街头进行了持续3天的激烈冲突,导致300多人死亡。为缓和关系,侯赛因与阿拉法特达成一个新协议。6月,战斗在安曼再次打响。游击队占领约旦国际饭店,扣押60名外国旅客为人质。5天的流血战斗造成至少700人的伤亡^{[11](P15)}。侯赛因再次做出让步,宣布解除他叔叔参谋长的职务,但他警告说:“这是解决我

们与游击队之间冲突的最后机会。”^{[11](P14)}8月底,侯赛因的车队再次遭到伏击,双方在安曼住宅区交火,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迫在眉睫。9月1日,侯赛因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再次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此后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侯赛因十分恼怒,约旦军队官兵个个义愤填膺。“国内和国际的因素都在诱使、鼓励和迫使侯赛因消灭游击队”^{[11](P27)}。正当此时,“人阵”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劫机行动,终于点燃了约巴战争的导火索。

五、罗杰斯计划引起的轩然大波

1969年12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计划,要求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媾和以换取后者从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撤军。巴解组织坚决反对通过联合国或者大国的任何折中解决方案,声称他们反对试图强迫他们的任何阿拉伯国家^{[11](P19)}。1970年2月8日,阿拉法特公开警告阿拉伯政府不要接受“美国的阴谋”如罗杰斯和平计划^{[7](P109)}。巴勒斯坦人在安曼示威游行,烧毁美国情报中心并捣毁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助理国务卿被迫取消访问约旦的计划。1970年6月,第二个“罗杰斯计划”出台。游击队在电台上扬言要“用子弹粉碎任何强制实施政治解决的企图”^{[9](P80)}。阿拉法特在7月31日的一次集会上说:“我们拒绝一切和平方法!”随后他又宣称,“我们将把约旦变成阴谋家的坟墓”^[12]。8月30日晚,双方在安曼进行激烈的战斗。9月5日,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达成了协议。但仅隔一晚上,冲突又在各地爆发。7日,在14国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4国委员会以监督双方停火。但就在此时,游击队为阻止埃及、约旦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发动了劫机事件,约巴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

六、“人阵”劫机事件与冲突的爆发

巴解组织强调以武装斗争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任务,但以乔治·哈巴什为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炮制了一种战术——劫持飞机,以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劫持一架飞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我们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以色列士兵”^[13]。1968年7月,“人阵”劫持了以色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以乘客和机组人员性命为要挟,迫使以色列释放了20名被监禁的阿拉伯囚犯。12月26日“人阵”分子对从雅典机场起飞的另一架以色列飞机开火。以色列进行报复,炸毁了停在贝鲁特机场的13架阿拉伯民航飞机,并明确宣布无论何时遭到攻击都将进行报复。

侯赛因十分担心“人阵”恐怖主义会给约旦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人阵”领导人却宣布：“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最严重的还在后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景也不会使我们退缩。”^{[14](P31)}

1970年9月6日和9日，“人阵”一气劫持了西方国家的4架民航飞机，并强迫其中的3架降落在约旦沙漠中的一个废弃的机场道森机场，以48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生命为要挟，要求欧洲各国释放关押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欧洲国家满足了要求，但恐怖分子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约旦方面的一再要求，公然在世界多家媒体记者的镜头前炸毁了所有飞机。劫机事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并加剧了约巴矛盾。约旦把劫机看做对国王权威的挑战，是革命的信号。约旦坦克包围了飞机场，同时一些军官将他们的军队开到安曼与巴解组织对立。巴解组织不仅没有谴责劫机行为，反而发表声明，要求“清除‘腐败分子’，并建立一个唯一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约旦全国政府”^{[11](P43)}。劫机事件给约旦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令约旦政府和国王在国际上声誉扫地。侯赛因被“人阵”的行为所激怒，最终决定以武力镇压巴解组织。他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宣称：“游击队劫持三架民航飞机是阿拉伯世界的耻辱……到了必须确定是要和平还是战争的时候了。”^{[11](P118)}而阿拉法特则号召他的战士做好准备，并命令发动进攻以推翻政府。双方的冲突不可调和，埋藏已久的矛盾终于以全面战争的方式爆发。

七、阿拉伯国家及美国的怂恿和火上浇油

在导致约巴矛盾加剧并最终诉诸战争的因素

参考文献：

- [1] Clinton Bailey. Jordan's Palestinian Challenge, 1948- 1983: a political history[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 [2] Alan George. Jordan: Living in the Crossfire[M]. London and New York: Led Books Ltd, 2005.
- [3] Sami Al- Khazendar. Jorda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M]. Berkshire: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 [4] Al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M]. London: IB Tauris, 1988.42.
- [5] Aqil Hyder Hasan Abidi. Jordan: a political study, 1948- 1957[M]. London: Asia Pub. House, 1965. 49- 52.
- [6]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M].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6.276.
- [7] John K Cooley. Green March, Black September: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Arabs[M]. London: Frank Cass, 1973.
- [8] Alan Hart. Arafat: Terrorist or Peacemaker[M].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Limited, 1984.
- [9] 托尼·沃克, 安德鲁·沃克斯. 阿拉法特传[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
- [10] Roland Dallas. King Hussein: A Life on the Edge[M]. London: Profile Books, 1999.139
- [11]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Black September[M]. Beirut: Colombani St. off Sadat St., 1971.
- [12] Judith Colp Rubin. Yasir Arafat: a political biograph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49.
- [13] 赵文亮.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与巴以冲突[J]. 郑州大学学报, 2008, (4).
- [14] Christopher Dobson. Black September: its short, violent history[M]. New York: Macmillan, 1974.43.

中，一些阿拉伯国家及美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虽然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但它们在暗中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巴解组织内部难以协调的原因就在于其七个派别分别由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作为后台，分别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埃及支持下建立了“法塔赫”，但阿拉法特成为主席后努力寻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为对抗埃及对“法塔赫”的影响，叙利亚支持下建立了“人阵”(PFLP)和“人民民主阵线”(PDFLP)，“闪电游击队”更是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分支机构；伊拉克帮助建立了“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和“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PPSF)，“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建立了自己的分支“阿拉伯解放阵线”(ALF)。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极端组织反对和平解决，“叙利亚鼓励‘法塔赫’进行袭击，但是小心大多数袭击跨越约旦边界进行，以便以色列的反击必然以约旦而不是以叙利亚为目标”^{[14](P17)}。在约旦危机中，巴解游击队谴责纳赛尔是“叛徒”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8](P315)}。在他们所携带的海报上还把他描绘成一头驴。纳赛尔极为震怒，告诉侯赛因应该“教训一下”巴解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再声明支持巴解组织。9月1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宣布，“伊拉克政府和驻扎在东部战线的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游击队”^{[11](P31)}。9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如果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威胁到约旦政府的话，美国将进行干预。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怂恿使冲突双方都感到有恃无恐，战争不可避免。